



关于东乡语元音

那德木德

蒙古亲属语的调查研究，是当前蒙古语学界引人注目的课题之一。然而对这个课题的研究至今尚处在比较落后的状况中。我院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计划和科研规划中，也规定了进行蒙古亲属语介绍研究的任务。笔者拟从东乡语、裕固语的调查研究着手，逐步深入地进行这项工作。我以往未曾搞过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有关东乡语资料也是近来初次接触，所以观察所得甚为肤浅，谬误之处实所难免。尽管如此，还是想把自己的初步探讨所得整理归纳成笔录，供研究者参考，并希批评指正。

东乡语在语音、词汇、语法结构诸方面有很多情况同蒙古语特别是和古蒙古语相同或者相合，同时这种相同或相合的情况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这对蒙古语的研究以至阿尔泰祖语的深入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现在，我们来逐一探讨一下东乡语的元音。

一、东乡语和蒙古语的〔a〕元音

蒙古语的〔a〕并非舌根元音，而是稍靠前一些的〔Λ〕。东乡语亦同样。

东乡语词的第一音节以后的短元音，一般不发生脱落、弱化以至形成复辅音的情况，所以〔a〕元音的前化现象并不多见。例如：

ajiku — 𐰇𐰺𐰍𐰏 (怕)	amin — 𐰇𐰏 (生命)
ama — 𐰇𐰏 (口)	agiku — 𐰇𐰏𐰍𐰏 (拿、取)
aṣivala — 𐰇𐰏𐰺𐰍𐰏 (大家)等。	

由于各个音节内的元音较为清晰，互相之间的影响就甚小。可是类似《qeṣṣa》(𐰇𐰏𐰺𐰍𐰏)、《neṣṣa》(𐰇𐰏𐰺𐰍𐰏)等词内〔aj〕的复合音节中的元音〔a〕则有前化现象。又如《𐰇𐰏𐰺》一词可以说成《eṣṣa1》等。

察哈尔土语中的前化元音〔a〕系古代的《𐰇𐰏》或《𐰇𐰏𐰺》(aji)两个音节中的〔j〕辅音脱落，形成二合元音，互相影响，逐渐成为《aji—ai—æ:》的。到后来，〔æ〕元音稳定下来，并影响到所有《𐰇𐰏》(i)元音构成的词，致短元音〔a〕变成〔æ〕，〔i〕元音弱化起来，使近傍的辅音发生一定程度的腭化。例如：〔ami〕(𐰇𐰏𐰺)变成了〔æmj〕。察哈尔土语〔æmjɔ〕，东乡语为〔amitu〕。

那顺巴雅尔同志说：“……东乡语的词汇，大体上由开音节词构成”。这一结论是正确的①。对于东乡语的〔ɑ〕元音，那顺巴雅尔同志认为属于央元音、不圆唇低元音，此说较确。但托达叶娃却说属“不圆唇、舌根低元音”。诚然，由于某些舌根辅音的影响，在个别词里听起来稍后的情况是有的，但是总的来说并不是那么后的。按照听觉，蒙古语和东乡语的〔ɑ〕元音似乎是相同的，但在具体的词里并不都是对应的。例如：

- 东乡语：axun (ᠠᠬᠤᠨ)，察哈尔为æ:l；
- 东乡语：amin (ᠠᠮᠢᠨ)，察哈尔为æmɿ；
- 察哈尔：ajag (ᠠᠵᠠᠭ)，东乡语为jixɑ；
- 蒙古语：tjad (ᠲᠵᠠᠳ)，东乡语为tɕəudu；
- 东乡语：ɕira (ᠶᠢᠷᠠ)，察哈尔为jar；等。

东乡语〔ɑ〕元音同蒙古语〔ɑ〕元音不完全对应，但同其他元音对应的情况却经常碰到。例如：

- 蒙古语：barɔ:n (ᠪᠠᠷᠣᠨ)，东乡语为borun；
- 蒙古语：xa'san (ᠬᠠᠰᠠᠨ)，东乡语为qosun；
- 蒙古语：mondor (ᠮᠣᠨᠳᠣᠷ)，东乡语为mandəu；

如此而已，恕不赘列。此种情况，从古代蒙古语发展到现代蒙语，元音在其构成过程中发生过许多变化。观察一下方言土语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察哈尔的əmf，在科尔沁一些地区叫omf。这种情形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比较研究。

二、东乡语和蒙古语的〔ə〕元音

在察哈尔土语中，〔ə〕元音一般为舌中元音。在少数一些词里发音犹若〔e〕。例如：ex (ᠡᠬ)；exləx (ᠡᠬᠡᠬ)等。

但是在东乡语里这个语音较为复杂。清格尔泰同志得出结论：“ɤ是舌尖元音，常用来表示国际音标中的〔ɿ〕和〔ʅ〕音，有时也表示不圆唇后闭元音〔ɯ〕”（《蒙古历史语文》58年第二期）。那顺巴雅尔同志说：“〔ɯ〕属舌后、不圆唇、闭元音”。又认为“〔ə〕是舌中、不圆唇、半开元音”。但是没有说明这两个语音是否各为音位？相互间究竟有何关系？托达叶娃也是除分别列举一些例词外，并没有指出它们的规律。

蒙古语的科尔沁土语中大都把〔ɿ〕（ə）发音为〔ɯ〕。拿蒙古亲属语或阿尔泰语系其他语言来说，阿塞尔拜疆语有类似〔ə、ə、ɤ、N〕的四个相近元音；土库曼语、楚瓦什语、塔塔尔语、巴什基里亚语、阿尔泰卡耳梅克语、哈卡斯语等，都存在类似〔ɯ〕的元音。

对于东乡语中的〔ə〕和〔ɯ〕，至今谁也还没有找到它们是属于两个区别意义的不同音位的根据。〔ə〕元音在词的任何一个音节中都可以见到，但是〔ɯ〕在词首却见不到，出现时常常要伴随辅音。

东乡语中有〔ə〕音位。这个〔ə〕在某些条件的作用下常常听似〔ɯ〕音，有时听起来

像〔e〕。在汉语借词里常见到很多〔ɤ〕元音，同时多出现在〔dz、tʂ、ʂ、z、dz、ts、s〕等类辅音之后，它们同汉语的舌尖元音比较接近。但是东乡语的这些辅音并不同于北京话的辅音，却与甘肃地方的汉语语音相似，所以该元音同〔ɿ、ʅ〕略有差异。在汉语中，这些元音虽被称作舌尖元音，但是如果舍弃它的辅音，则大体同〔ɤ〕的读音相同。东乡语中还有一部分词里的〔u〕元音，因于发音时嘴唇的参与松弛，听起来好像〔ɤ〕音。例如：

Pwsəd (ᠪᠠᠰᠠᠳ), Kwwan (ᠬᠤᠪᠠᠨ), ʂwdun (ᠰᠠᠳᠤᠨ) 等。以前的调查者把一部分阳性〔ɿ〕记成了〔ɤ〕，例如把《ᠮᠢᠭᠠᠮᠢᠬᠠ》一词记作〔miga—mika〕，致使有的人记作〔muwa—mwa〕；把《ᠭᠤᠮᠤᠰᠤᠨ》记作〔Gwmusun〕，把《ᠠᠪᠠᠨ》记作〔awun〕，其实这些都不是〔ɤ〕，可能是阳性〔ɿ〕。因此，把当作〔ɤ〕对待的元音之一部看作〔ə〕或〔e〕的窄化是可以的。讲话时听起来比〔i〕为宽，稍后一些。〔ə〕音位存在〔ɤ、e、ɿ、ʅ〕之类的变体。察哈尔语音中也有这类变体，例如：ᠠᠮ — əm、ᠡᠬ — ex、ᠳᠠᠰᠤᠨ — dawsɿŋ等。近年来清格尔泰同志说：“〔ɤ〕是后、不圆唇、闭元音，其它几种语言的〔ə〕元音发音时稍窄并靠后时就会出现这样的读音”。这一说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蒙古语的〔ə〕元音也是较为复杂的元音。如在科尔沁的一些地方发作〔ɤ〕，卫拉特、鄂尔多斯发作〔e〕，察哈尔发作〔ə〕等。桑席耶夫对于这一元音是这样说的：“e—非圆唇的半闭元音，在所有蒙古语方言中都是存在的，且具多种样式：1）达斡尔和布里亚特方言中，这个音的读音虽则大部在舌中，但因受边音〔i〕的影响，较为前化，同闭音〔i〕接近的情况甚多，故在标音时常常被记作〔ë〕；2）喀尔喀卫拉特方言这个元音的读音在舌尖部位。但是如果受到别的语音的影响时（对喀尔喀方言而言）便成为闭元音。这样一来，〔e〕音位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造成的变化所左右，在很多蒙古学的语言研究著作中，常常被记作〔ə、e、è、ë〕等符号”②。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且有巴思八文中的两个〔e、è〕音为佐证。

至此，我们还应当指出的一点是，东乡语的ɤ或ə元音有时由于受某个辅音的影响，发生无声清化现象。例如：Pwsədu (ᠪᠠᠰᠠᠳᠤ), qwdzə (ᠬᠠᠳᠤᠰ) 等。这一现象在察哈尔土语里也有，如把《ᠬᠠᠳᠤᠰ》为qətə: 《ᠬᠠᠳᠤᠰ》读如qət:等。

三、东乡语和蒙古语的〔o〕元音

古代蒙古语有一个〔o〕圆唇元音，但是不能认为，就是这个元音经过分蘖之后才产生了几个元音。在回纥蒙文里，这个元音在书写上没有什么区别，在古蒙古语里没有唇和谐。随着蒙古书面语的逐步形成，含有古代蒙古语〔o〕元音的词，大多数演变成了现代口语的〔ɔ〕，还有一部分词演变成了〔ω、o〕或〔ø〕元音。在各个蒙古语土语中〔o〕元音的构成情况也是不平衡的，察哈尔土语为〔o〕，卫拉特、鄂尔多斯为〔ø〕，科尔沁、巴尔虎布里亚特土语中无，但在巴尔虎布里亚特土语中却有长元音〔o:]，科尔沁的某些地区读如〔uə〕。东乡语的〔o〕元音有时读如〔ɔ〕，有时读如〔ω〕，有时候又似乎读作短复合元音〔uo〕。1958年清格尔泰同志作出结论说：“〔o〕的读音在一般情况下同复合元

音〔uo〕相似,当它出现在小舌音或喉音前后时,好像蒙古语的〔o,ɔ〕。bosw〔buosw〕ᠪᠣᠰᠤᠬᠤ、ɔ·eo〔ɔ·eo〕是短元音。(原文用斯拉夫音标——作者)含有〔ɔ〕的读音,介于蒙古语的〔ɔ〕和〔u〕之间,并接近〔u〕”。(《蒙古历史语言》1958年二月号第46页)。托达叶娃说:“o—圆唇舌中元音”。③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东乡语的〔o〕元音和蒙古语的圆唇元音的对应情况:

同〔o〕对应的如:

ᠮᠣᠷᠢ	—	ogi,	ᠮᠣᠵᠢᠨ	—	onjtʃin	
ᠮᠣᠷᠢ	ᠨᠠᠭ	—	uoruŋ,	ᠮᠣᠷᠢ	—	morəŋ
ᠮᠣᠷᠢ	(ᠨᠠᠭ)	—	mo,	ᠮᠣᠷᠢ	—	nokə
ᠮᠣᠷᠢᠨ	ᠰᠣᠯᠵᠠ	—	Soljə~Suljə,	ᠮᠣᠷᠢᠨ	—	oljəsuku
ᠪᠣᠰᠤ	—	bosw等;				

同长〔u:]对应的如:

ᠮᠣᠵᠢ (口语中读作〔u:l]) — oljəŋ等;

同〔ɔ〕对应的如:

ᠮᠣᠷᠢ	—	mori,	ᠮᠣᠵᠢ	—	mozi	
ᠮᠣᠷᠢᠨ	—	morutu.	ᠮᠣᠷᠢ	—	pori	
ᠮᠣᠷᠢᠨ	—	(ɔ:), nokosun,	ᠮᠣᠷᠢ	—	oqo,	
ᠮᠣᠷᠢᠨ	(口语oxin)	—	otʃin,	ᠮᠣᠷᠢᠨ	—	Sonosu,
ᠮᠣᠷᠢᠨ	—	tosuŋ等。				

蒙古语书面语里以〔ɔ〕(ɔ)起首的一些词,在现代蒙古语口语里已经变成〔o〕元音。这个元音在东乡语里,有一部分变成了〔o〕,另一部分仍保持着〔ɔ〕的原型。如:

ᠮᠣᠷᠢ	—	osuŋ,	ᠮᠣᠷᠢ	—	oduni,
ᠮᠣᠷᠢ	—	toduni,	ᠮᠣᠷᠢ	—	əɔə,
ᠮᠣᠷᠢ	—	tʃiəmu,	ᠮᠣᠷᠢ	—	ətʃi,

这个〔ɔ〕也有变为〔u〕的如:ᠮᠣᠷᠢ—udu, ᠮᠣᠷᠢᠨ—musiku等;还有《ᠮᠣᠷᠢᠨ》一词在蒙古语里为tʃomog,但在东乡语里却为teuməgə。

东乡语的〔o〕元音的读音,在前后辅音的影响下有着些微的差别,例如kuon(脚)、guoguoku(吃奶)等。总的来看,具有阴性元音的性质。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蒙古语的词汇日渐丰富起来,为了克服元音音位的贫乏,一部分读音相同或相近而含义不同的词,越来越有必要在口语里加以区别,这就形成了蒙古语中各种元音不断增生的情形。如果说古代蒙古语里仅仅有两个圆唇元音的话,那么最低限度像《ᠮᠣᠷᠢᠨ ᠮᠣᠷᠢᠨ ᠮᠣᠷᠢᠨ》一类的词,其末尾的短元音脱落后,只能留下〔od, ud〕这一形式。因此,〔ɔd, ɔd〕这种形式就有了产生的必要。这种情形同第一音节以后的短元音的弱化和词尾短元音的脱落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在东乡语里没有经过上述阶段,所以圆唇元音未能增生。这也是东乡语自身发展的一个特点。东乡语在其词汇不断丰富情况下区分词的意义时,没

有经过增加语音的途径，而是通过重音、辅音的变换和音节数量的增减等手段获得发展的。

四、东乡语和蒙古语的〔u〕元音

古代蒙古语里有一个〔y〕圆唇元音，回纥蒙古文字中以〈 𐰽 〉的形式书写于词首。它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 ω 、u〕两个元音。这个元音以没有唇和谐的身份经常出现在词的第一音节之后。蒙古语里〔 ω 〕为阳性元音，〔u〕为阴性元音。但是在东乡语里这个元音比较复杂，它在任何词里都可以碰到，只是在不同的词里听起来音质略微不同而已。其读音大体上如同〔u、 ω 、 $\omega\sim ua$ 、wa〕等。清格尔泰说：“u的读音具有介于蒙古语 ω 和u之间的性质，并与u接近”。④察哈尔土语里有 ω 、u元音，卫拉特有u、y元音，达斡尔语中有 \circ 和 ω 结合而成的 \circ 元音。在喀喇沁土语里 ω 元音为 ωa 复合短元音。蒙古语口语里， ω 、u只能在词的第一音节中见到。第一音节以后的各音节中，可以在 ω 之后和a、u之后碰到像 \circ 一类的弱化元音。这两个元音的主要特点在于，具有半唇化情形，如果除去唇的参与，则 ω 就似乎变成了a，u就变成了 \circ 。喀喇沁的某些词里见到的 ωa 或ua也表现了半唇化状态。依·鲍培曾说：“蒙古语族语的u，可以用现代蒙古语的u来表示，但是还存在特殊的变异。对此，看一看具有变化规律的〔A〕和没有变化规律的〔B〕是必要的”⑤。这一说法正好反映了蒙古语和东乡语的u元音在进行比较时，有的有规律可循，有的却没有规律可循的实际状况。从听觉的角度来讲，对辨别音色问题进行深入细微的研究是必要的。现将本人记录的几个例词列举如下，以供参考：

ulje	𐰽𐰺𐰍 、	usu	𐰽𐰺𐰍 、	usun	𐰽𐰺𐰍 、
fudu	𐰽𐰺𐰍 、	toqotea	𐰽𐰺𐰍 、		
Gonij	𐰽𐰺𐰍 、	Gona	𐰽𐰺𐰍 、		
Goranj	𐰽𐰺𐰍 、	uanŋj	𐰽𐰺𐰍 等。		

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对东乡语初次接触的人来说，分辨它的某些语音是很困难的。东乡语的u元音究竟和蒙古语的哪些元音相对应呢？简言之，有如下对应情形：

𐰽𐰺𐰍 (owol) — uwun, 𐰽𐰺𐰍 (orgox) — uku,

𐰽𐰺𐰍 (jowog) — suməgə,

以上词里的u，同蒙古语的 \circ 元音相当。

𐰽𐰺𐰍 (otas) — udasun,	𐰽𐰺𐰍 (os) — usu,
𐰽𐰺𐰍 (norə) — nurun,	𐰽𐰺𐰍 (sol) — sula
𐰽𐰺𐰍 (som) — sumu,	𐰽𐰺𐰍 (tol) — tulu (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tos) — tusa,	

以上词里的u元音同蒙古语的 ω 元音相对应。

𐰽𐰺𐰍 (udɕu:r) — udzu,

𐰽𐰺𐰍 (du:rəŋ) — durun~degur,

𐰽𐰺𐰍 (tul) — tulja,

以上词里的u元音同蒙语的u元音相对应，这种对应尤为多见。

另外，东乡语的u元音还有同东乡语的o元音相对应的情况，如：

ᠮᠣᠳ (mōd) — mutu, ᠰᠤᠬᠤ᠎ᠠ (sōxōr) — suko,
ᠲᠤᠭᠤᠨ (toᠭo:) — tugaŋ等。

蒙古语的书面语里有一部分以《ᠢ》(i)起首的词，在现代口语里已变成了园唇元音。但是东乡语里有的有所变化，有的则没有变化。例如：

ᠨᠤᠳ (nud) — nudun,
ᠨᠢᠨᠪᠤᠰᠤᠭ (nōlmas) — numbusuᠭ (ᠨᠢᠨᠪᠤᠰ) 如果指眼泪时可说nigusuᠭ。
ᠨᠢᠵᠤ (nu:r) — nju, ᠲᠡᠰᠤᠭ (ᠲᠡᠰ) — tēusuᠭ,
ᠰᠢᠳᠤᠭ (ᠰᠢᠳᠤᠭ) — ᠰᠢᠳᠤᠭ, ᠠᠲᠤᠭᠠᠨ (xōtag) — qutako 等。

蒙古书面语中，为了区别某些词的词义，使用《ᠢᠬᠢ—ᠢᠬᠢ》等类的词尾元音区分法。这种现象一方面可能同文字学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属于古代说法的痕迹，而到了现代口语中都成了[xar]。但是在东乡语里，durun(ᠳᠤᠷᠢᠨ)和duran(ᠳᠤᠷᠠᠨ·ᠢᠬᠢ)则含有不同的词义差别，又如fuda(ᠮᠤᠳᠠ)、fudu(ᠮᠤᠳᠤ)亦然。

现代蒙古语口语里的四个园唇元音᠋、᠋、o、u，不用说是由古代祖语的o、u(y)演化而来的。但是哪个元音究竟属于哪个元音的演化，无法作出明确的答复。此点我们可以从东乡语的状况得到了解。

比较阿尔泰语系某些语言的园唇元音，它们的数量方面和读音方面都有一些差别。请参阅下表：

语 种	园 唇 元 音
蒙 古 语	᠋ ᠋ o u
满 语	᠋ ᠋ o
突 厥 语	᠋ u ø y
阿 塞 尔 拜 江 语	᠋ ᠋ ø y
楚 瓦 什 语	᠋ u y
塔 塔 尔 语	᠋ ø y
阿 尔 泰 卡 耳 梅 克 语	᠋ u ø y
雅 库 特 语	᠋ u ø y
乌 兹 别 克 语	᠋ ᠋ u
萨 拉 语	o oh u ø øh y
布 里 亚 特 语	᠋ ᠋ u
达 斡 尔 语	᠋ u (y)
土 族 语	o u
保 安 语	o u
裕 固 语*	o u ø y
东 乡 语	o u

* 裕固语在这主要指哈拉裕固语。

五、东乡语和蒙古语的〔i〕元音

蒙古语的元音内《ᠢ》(i)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元音。在各方言中这个元音有着各自的不同特点。但对它的研究目前尚处于落后状态。察哈尔和喀喇沁土语里《ᠢ》(i)元音是按阴阳性严格区分的,别的方言里究竟如何,尚待进一步探讨。

据说《ᠢ》(i)元音在古代蒙古语中有阴阳性之分。在古代蒙古语里,出现过三次音节变化,即:进入词的某一元音的d、t辅音之后出现的i或ᠢ元音,演化成别的元音,而这种辅音又变成ᠳ、ᠲ辅音。这种现象,桑席耶夫把它解释为“《ᠢ》(i)的三个屈折”,但是对于《ᠢ》(i)元音的异化却未能给予圆满的解釋。阿尔泰祖语和古代蒙古语里有过ti、di音节,到了十七世纪的时候,演变为ᠲi、ᠳi或者别的什么语音,这是事实。但是i元音的异化,特别是词首音节中的i元音后退同化现象,这同蒙古语里产生了四个圆唇元音、产生了唇和谐、词首音节之后的元音弱化以致仅起复活辅音的作用而又大量产生了复辅音的结果关系甚为密切,甚至同词的重音变化也不无关系。

阿尔泰语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存在元音和谐律。大凡某个语言,它的阴阳性元音和谐律如果很严密的话,那么它就不会有中性元音这个现象。这虽则不是语义学上的要求,但却是在发音器官功能上的需要。我们暂不说蒙古亲属语,就拿没有元音和谐律的汉语来说,“代”——dai和“对”——dui两个词里的i元音,难道按照发音器官方面的情形它们在音质上正好相同吗?因此,蒙古亲属语的i元音,当它和别的语音相结合的时候,到底是个啥情形呢?我们在五十年代调查时却严重忽略了这个问题,而作出了它是中性元音的结论。尤其是对有无阴性和阳性i元音音位的问题,更没有作认真的考虑。

我们参阅东乡语的某些调查材料时发现,任何一个词里碰到的i,都是用同一个符号记录的,有的i被记作〔ᠢ〕或〔ᠣ〕,尤其是把〔dz、ts、s、dʒ、tʃ、ʃ、z〕等辅音之后的、听起来十分清晰的舌尖元音用俄文字母〔ᠢ〕进行记录,后来用国际音标转写时又变成了〔ɯ〕。例如:cigacyH~сггacyH(血管)。也有把舌尖元音直接记为〔i〕元音的。

《ᠠᠳᠠᠰᠤᠨ》一词在东乡语里实际是这样说的:Sldasun~Sdasun。

东乡语的i元音虽则大都在第一音节辅音之后出现,但是在ti、di、xi等辅音之后从未见到。奇怪的是如果X辅音之后出现i的话,则常常变成ki,同卫拉特(鄂尔多斯)方言的情形相似。

六、关于元音的结合和长元音

东乡语的词中一般不存在复辅音,一个音节总是由一个元音和一个辅音相结合构成。因此,大量存在着元音—辅音音节和辅音—元音音节,这和古代蒙古语的音节甚为相近。

但是东乡语的元音之间却存在着按照一定的语音规律进行互相组合的现象。对此,截止目前我们尚未能予以详尽的加以揭示。

刘照雄编著《东乡语简志》一书中说，“东乡语的复元音按其结合成分可分为二合元音和三合元音。二合元音按发音情况又分为前响二合元音和后响二合元音”。同时把 ai、əi、uo、ou 叫作前响二合元音；把 ia、iə、ua 叫作后响二合元音。而“三合元音有 iao、iou (iu)、uai、uəi (ui) 四个”。⑥

那顺巴雅尔认为，东乡语有“ai、au、ou、ui、əi (下降二合元音)、ia、io、iu、iə、ua (上升二合元音)、uai、iau (三合元音)”等复元音。

清格尔泰认为东乡语有“ai、au、əi、əu、ou、ui、ia、iə、io、iu、ua、uai、iau 等复合元音”。

上述举例虽则相互之间似乎基本上一致，但是也有细微差别。按清格尔泰的说法有əu复合元音，而按那顺巴雅尔和刘照雄的说法，没有这个元音；按清格尔泰和那顺巴雅尔的说法有io这个复元音，而刘照雄的却无；清、那的说法有iau复元音，刘的说法则有iao复元音；刘的说法有uai、iou，而其他二位的说法则无。对于含有这类元音的词，各人的说法亦有差别，如那顺巴雅尔：təiorun (ᠲᠡᠶᠢᠣᠷᠦᠨ)，刘照雄：təiaorun等。

蒙古语在古时候同样是以单元音构成音节的，每一个辅音的或前或后都必须有元音出现。到了后期元音和谐律发生很大变化，如词首音节中的元音起了变化，词内元音弱化，复辅音产生，各个方言里不同程度地形成了一些长复合元音。近代蒙古语里发生了复合元音同化并向长元音转化的趋势。

拿东乡语来说，词首音节里的元音并没有被全部同化，例如：ᠨᠠᠳᠤᠨ — nudun (其词首音节里的元音已同化)；ᠮᠤᠪᠠ — muba (其词首音节里的元音照旧保留着)；ᠣᠰᠤᠨ — osun, ᠠᠲᠰᠢ — ətsi (蒙古语里叫ᠠᠲᠰᠢ)。由此可见，东乡语尚处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即其元音和谐律尚不十分严格，复合元音尚未完全形成，长元音尚未成为一个系统(偶然可以听到)。

东乡语里没有[ai、əi、ui]一类的复元音，但存在aj、əj、uj这样的音节。那顺巴雅尔把《ᠠᠵᠢᠬᠤ》记为[ajiku]是很准确的，这个词的音节划分就是：a—ji—ku。但是该同志把“站立”一词却记成了[baiku] (ᠪᠠᠢᠬᠤ)，实际应为[bajiku]。

再举数例：taj — ᠲᠠᠵᠢ, duli—duləj — ᠳᠤᠯᠢ
 najma — ᠨᠠᠵᠢᠮᠠ, ujljə — ᠤᠵᠯᠵᠡ
 ujlaqu — ᠤᠵᠯᠠᠬᠤ等。

但是不存在oi→oj这样的格式，而存在bəjjə (ᠪᠡᠵᠵᠡ) tajia (ᠲᠠᠵᠢᠶᠠ)这一格式。这里似乎是j辅音的延长。同时听起来j的后面有时候有i，有时候却没有。

古代蒙古语里的《ᠠᠵᠢ·ᠠᠵᠢ·ᠤᠵᠢ》等格式实际上就是aji、əji、uji，后来演化为ai→ei，əi→ei，ui→yi，现在大都变成了e:、E:、y:、Y:。在察哈尔土语里有时听起来好像复合元音，而且并非下降复合元音，而是上升复合元音。

阿尔泰语里，按元音+辅音+元音的格式构成长、复合元音的情形并非蒙古语所独有。我们以吉尔吉斯语为例来看：该语言里共有六个长元音，这些长元音是由两个元音之间的辅音脱落形成的。古代吉尔吉斯语为例来看：该语言里共有六个长元音，这些长元音是由两个元音之

间的辅音脱落形成的。古代吉尔吉斯语的tapup, 现在变成了ta:p, 含有“寻找”的意思。假如说成tap, 那就有了班级、队、阶级的含义。波斯语说baha, 吉尔吉斯语为ba:(баһа), 波斯语说bahadur, 吉尔吉斯语说ba:tir(баһадур)。东乡语说aβan(аһан)、吉尔吉斯语ajil。蒙古语说e:l, e:l:l, 等。东乡语里不仅有aji、əji、uji等类型, 还有很多仍保留着辅音的词, 例如: nokosun(ноқосун)、tʂokon(тҷокон)等。

东乡语里有ao、au、ou、əu、ua、uaj等类型的复合元音。近代蒙古语里这类复合元音已经变成了长元音, 例如: ауһаһи 、 ауһаһи 、 ауһаһи 等。东乡语的这类复合元音未能来及演化成长元音的情形, 就证明了该语言的元音和谐律不甚严格, 元音异化也较弱。如果认真观察上述几个复合元音, 实际上ao和au没有什么差别, ou和əu也不是很清晰的, uai—uaj实为一个音质。所以概括起来说, 只有au、ou、ua等三个复合元音。例如: saou—sau(сау)、doura(дору)、quajtsin(қуажтын)等。

还有, 前面提及, 听起来有些象uo、ua一类短复合元音的, 实系o和u的语音音质问题。这里还应说明的一点是, 复合元音ua只在Gua(гуа)、dzeruan(дзеруан)等少数几个词里出现, 多数情况是出现在外来借词中。

在蒙古语里已经长元音化了的一些词, 东乡语里却读作短元音词。例如: ula(ула)、jan(жан)、toridzi(торидзи)等。这种情形在满洲——通古斯语里也经常见到。东乡语里有时也可以听到长元音, 如: qa: — қа 、 қа : ka — қа 、 қа : la(қала)。

有的同志认为, 东乡语存在ia、iə、io、iu等类复合元音。这种说法并非绝对不能成立, 尤其是常常出现在外来借词里。但是东乡语里有一批特殊的辅音, 如dz、tɕ、ɕ等, 它们属舌面前辅音, 其后接以元音时, 听起来有点象i元音。

格·特·桑席耶夫在他1953年出版的《蒙古语比较语法》一书中写道: “有时在书面语里见到的由 ur 、 ur 、 ur (ur 、 ur 、 ur)等组合而成的所谓上升复合元音, 实在是进入腭化辅音之后的长元音罢了”。这一说法反映了喀尔喀、察哈尔和苏尼特方言的实际情况, 同时也适于东乡语的情况。但是由于东乡语里缺乏或没有长元音, 其属于短元音是无疑的。

东乡语里除dz、tɕ、ɕ之外, 还有一部分辅音在腭化, 例如: gjemə(гемә)、 njeri (нери)、 gjedze (гедзе)、 bjeri (бери)、 mjenggu (мјенгу)、 njukaku (нјукаку)、 kjeljan (кјелјан)等。

蒙古语一般在阳性词里存在腭化现象, 但是东乡语却在(dz、tɕ、ɕ除外)阴性词里常见到, 这确是一个奇特现象。

总而言之, 东乡语元音音位共有a、ə、i、o、u等五个。但是东乡语还有几个土语差别, 所以相互之间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概括几种土语的一般特点, 我以为上面所述元音音位的情况基本如此。

1982年2月5日

杨才铭 译 (下转19页)

幕，向神佛祈祷，向观众祝福，有时还介绍一下正戏的内容。

二、“雄”（ཇུང），是正戏，长的有唱几天的。场面多和汉族南曲近似。

三、“扎西”（བཟ་ཤིས་），是演戏结束时的祝词。也有歌舞，同时接受观众的的捐赠。

“顿”和“扎西”虽然是一种宗教仪式，因袭“跳鬼”来的。但表演的形式则是歌唱与舞蹈相结合，中间夹杂着说白。演唱的演员在场中心，未上场或退入行列的演员伴唱伴舞，有类似汉戏（元曲或现在的川剧、陇剧）的帮腔。

伴奏的乐器很简单，一般只有大鼓一面，铜钹一付，有的地方（如康地）加用锁呐与长号。乐器是伴随舞蹈的节奏的。歌唱时，乐器停奏，为的是免影响观众的听闻。

以上所介绍的藏戏表演形式，都是指解放前而言。解放以后特别近几年来，已有舞台演出，无论服装、道具以及器乐布景等方面都有了改变，表演形式也有了新的发展。

注：

①见《民间文学》1958年12期

②藏族群众认为孔雀虽美，但却吃有毒的东西。此处比喻反动农奴主衣着华丽，内心狠毒，有如孔雀。全诗讽刺农奴主不劳而获，靠剥削生活（见《藏族民歌选》164页，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③引自《藏族民歌选》

（上接72页）

注：

①引自《蒙古语言研究论文集》（内蒙古师范学院印刷）那顺巴雅尔同志的文章。

②见格·特·桑席耶夫《蒙古语比较语法》的语音概述。

③托达叶娃《东乡语》，莫斯科1961年版—语音部分。

④引自鲍培著《蒙古语比较研究绪论》语音学部分。

⑤本文列举的突厥语词例引自埃·捷尼舍夫《突厥语言研究导论》一书（其中有的是者转写为国际音标）。

⑥刘照雄《东乡语简志》。